

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從十五位著名學者的訪談錄中，感受他們的
人生體會和獨到見解。



文化超現代

鄭培凱 馬家輝 編著



商務印書館

文化超現代

鄭培凱 馬家輝 編著

商務印書館

文化超現代

編 著 …… 鄭培凱、馬家輝

責任編輯 …… 黎耀強

封面設計 …… 李景民

出版 ……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 3 號東匯廣場 8 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印刷 ……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 6 號海濱工業大廈 4 樓 A

版次 ……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印刷

© 2000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6296 7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文
化
超
現
代

劉
平



序

鄭培凱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與君一席談，勝讀十年書”，是我們時常聽到的恭維話。往往是向對方表示欽仰，再戴一頂高帽子，說自己受惠良多。“勝讀十年書”，頗有誇大之嫌，好像受惠者遇到了一代宗師，不止是“傾囊相授”（那需要長久的培養與訓練），而是採用武俠小說中的“醍醐灌頂”之法，在頃刻之間就能把畢生功力灌注到受知之人。

然而，這句話也不盡是誇大之詞，還真有現實依據。有時我們讀書十年，累積了很多知識，可是無法貫通，想不出一個清楚的脈絡。一旦有緣見到一位大師，三言兩語，有所點豁，居然登時恍然大悟，豁然貫通，多年困惑，都能得到透徹的理解。說來雖玄，像禪宗強調的頓悟之道，但卻頗有道理。

本書所輯的十五篇談話，就有這樣的功效，能讓人聞之神往，豁然通曉。道理很簡單，因為受訪者一生浸潤在文化學術領域，對學術議題或人生體會有其獨到的見解。在一個小時的訪談之中，海闊天空，隨興暢談，反而完全脫除了學術論述的固定模式與專業話語，點到了許多關鍵，並以隨興的方式表達了深刻的觀點。

普通話台的陽春白雪

呈現在讀者眼前的這十五篇訪談錄，都是在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上播出的。這個訪談節目，由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與香港電台合辦，主要目的有兩個方面：一是普及學術文化的探討，讓學院以外的社會大眾也有機會知道當前的重要文化議題；二是以輕鬆平易的談話方式，討論嚴肅的學術文化內容，以大眾媒體作講壇，請專家學者現身說法，用迂迴的文化策略，反過來影響學院，特別是正在學院中研究文化專題的學生。

我非常感謝香港電台的高瞻遠矚，能讓這樣的陽春白雪節目佔了寶貴的時段，每週一次，毫無間斷，持續了一年多，而且還在繼續發展。這一年多來，我從文化圈的朋友及校園內的學生，都聽到一些鼓勵之辭，顯示到處都有些有心人，樂於見到香港能有高層次的文化發展，而非只是着眼於聲色犬馬的“消費文化”。

這就讓我想起香港的文化定位問題，同時也涉及了我們這個訪談節目為什麼稱作“文化超現代”，為什麼要以海闊天空的方式，無邊無涯地探討專業學術問題。

得天獨厚的流動型文化

談到香港文化定位，就會引起一些人(特別是香港以外的文化人)的疑問：香港有文化嗎？香港不是“文化沙漠”嗎？香港文化除了吃喝玩樂、聲色犬馬，還有什麼值得驕人的？香港的精英文化、學術成就，能跟北京比嗎？能跟台北比嗎？

能跟上海比嗎？香港自稱國際都市，在文化藝術的展現上，能跟紐約比嗎？能跟巴黎比嗎？能跟倫敦比嗎？甚至能跟東京比嗎？這一連串的疑問，其實是充滿了貶意的質疑，基本觀點就是香港沒有“自身”的文化。除了經濟貿易、聲色犬馬，沒有可以超過其他大城市的“文化優點”。

這種貶斥觀點的形成，有其歷史原因，與英國殖民政策及中國人愛國義憤有關，說來話長，這裏且不細論。但是，有一點值得在此提出，就是香港文化的定位，從來不從自身本位出發，總是“外人說了算”：英國人當然是充滿了殖民優越眼光，中國的文化人也多少戴上二手的殖民色彩有色眼鏡看香港。久而久之，香港本地人也自嘲“文化沙漠”，小老百姓更是理所當然的“聲色犬馬”起來。當全世界的人都說香港沒文化、不可能有文化、不配有文化時，香港人還能說什麼？

不過，當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香港，仔細思考香港文化應當如何定位時，就會發現：香港的文化有不同層次的發展，高低都有，華洋皆備，不僅是簡單的“經濟生活的感官反應”而已。從長遠的歷史發展來看，香港在中西文化接觸碰撞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直接影響中國人的文化意識。就算我們不從宏觀的歷史視野來看，只說近百年的具體史實，就不知有多少文化精英人物曾在香港落腳，或過境、或流亡、或定居。過去討論香港文化，只把這些人當作“過境人物”，這些人也自認為“過境”，與香港文化無關。然而，真的無關嗎？別忘了，“文化過境”是與機場轉機過境不同的。

假如我們把文化的發展粗略分成“固定”(本鄉本土)與“流

動”(穿梭來往)兩種形態，則香港顯然有着深厚的流動型文化。一方面影響了香港本地的文化發展，如魯迅、胡適、許地山、陳寅恪等人來到香港，並不是來觀光旅遊的。不管是來批判還是來建設，都對香港的文化發展有所貢獻。另一方面，所有流動過境的文化人士，都帶着他們對香港的印象，成為一種文化參照，影響了更廣泛的中國文化發展。特別是抗戰爆發之後，一撥一撥的文化、藝術、影劇人士匯集香港，怎麼可能只與香港這片土地有關，而與文化無關？

且舉二十世紀末的紐約為例，文化藝術大有發展，是有目共睹的，但紐約的居民有一半是外國人，剩下的一半，還有百分之五十是來自外地的。也就是說，“流動性”是紐約文化的重要資源，撫育了紐約本地的文化，不斷能夠更新創造。

我們認為，香港得天獨厚，有最優秀的條件來發展流動型文化。因此，在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我們舉辦各種文化藝術講座，在香港電台進行文化訪談，不止是讓全世界經過香港的文化人留下“雪泥鴻爪”，更希望累積文化資源，為香港文化的發展盡一分力。

超越現代與傳統

為什麼我們的電台節目取名“文化超現代”呢？曾有不少人問：“超現代”是不是“後現代”呢？我可以簡單回答，不是。“超現代”是有超越現代之意，是為了超越“傳統”、“現代”這種簡單的二分法，而非加入以文化批判理論為依據的“後現代”陣營。

大約在四十年前，我還是一個中學生的時候，在台灣出現了一場文化論戰。在相當程度上，這場論戰延續了一九三〇年代社會史論戰的議題，但因台灣當時還處於戒嚴時期，所以論戰不涉及政治經濟與社會等敏感議題，只集中在文化思想層面。我還記得，那一代對文化思想有興趣的年輕人以為，《文星雜誌》提倡自由主義與全盤西化，形成了一個“西化即現代化”的陣營，另一方則高舉傳統文化的大旗，附和台灣政府的“復興中華文化”政策。在我們的心目中，官方提倡傳統意識型態，只顧壓制與禁錮，讓人沒有自由，喘不過氣來。因此，對於代表“現代化”的西化派，充滿了好感；對現代化已充分發展的歐美，充滿了嚮往。回顧四十年前台灣的認知環境，整個文化氛圍是閹閉、黑白對立、非此即彼的二元化抗爭情況。固然是由於自己年輕，思維方式過於簡單化，但環境的壓迫感也逼着年輕人採取簡單化的二分法，以求出路。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現代化、民主、自由、富強、繁榮，另一方則是傳統文化的落後、封閉、獨裁、壓迫、貧窮、困苦。很自然的，我也和大多數朋友一樣，嚮往着歐美，鼓吹“現代化”。

不過，我們當時對“西化即現代化”的論點、對“全盤西化”的口號，卻有些保留。我雖然還沒學過邏輯，但卻知道有“目的”與“手段”之分，有“目標”與“策略”之別。嚮往西方、提倡現代化的目的，不是要使中國人變成“黃皮白心”的香蕉型中國人，只知西方文化，拋棄自己的文化認同。學習西方，提倡現代化，是為了讓新一代的中國人生活得自由、民主、美好、幸福，不要再作悲憤的中國人，要作快樂的中國人。這

樣的想法雖然幼稚，過了四十年回頭看看，卻也沒錯。

在文化論戰的當時，有一位胡秋原提出一條出路：“超越傳統、俄化、西化，而前進”。對胡秋原的口號及論點，我們覺得雖然有點道理，但沒有具體的實行方案，“策略”上不可行，因此是空話。就像我們當時讀吳稚暉的文章，聽他說自己是無政府主義者，也提倡無政府主義理想，但實行卻要在三千年以後，只以用吳老先生常用的“質俚”語言回應：“放屁”。

西學為體，中學為用？

然而，歷史的確充滿了反諷。才不過四十年，台灣與香港的歷史處境卻是已經現代化了，已經納入了全球化體系。文化人大聲疾呼的，早已不是傳統與現代的對立，而是如何以“後現代”、“後殖民”來顛覆“現代”了。胡秋原在四十年前的“空話”，現在卻有了實際的歷史環境，成為我們必須面對的文化議題。這並不是說，胡秋原在四十年前提出的“文化超越論”，真有先知先覺的“歷史預見性”，而是歷史的具體發展，有時是迅雷不及掩耳，令人措手不及，使我們面對了實際的（而非假想的）文化情況，必須從“策略”上認真思考。真要說什麼“先知先覺”，我們就要舉四百年前與利瑪竇論學的徐光啟與李之藻，或者說得近一點，觸及現代化西學（雖然並不懂）的張之洞。

其實，只從“目的”或“目標”的文化本體性來探討，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才是近一百五十年來，最有真知灼見的文化超越論，是探討中國文化變遷的方向性綱領。

因為其理論關鍵，就是中西文化一定有衝擊與融合，也就有主從之爭，“體用”的提出，有助於消弭爭端。然而，張之洞因為自己維護傳統文化的偏向，面對中西融合時，便採取了“體用”的策略，在本質上作了二分，以體為主，以用為輔，保證中國文化不會墮失，不會“用夷變夏”。不過，歷史跟張之洞開了一個大玩笑。到了二十一世紀，他的“體用說”仍是探討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主要架構，但實際運作上，已有不少中國人是在講“西學為體，中學為用”了。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基本已接受中西文化的融合是歷史發展的主流，在日常生活上更是“學貫中西”。究竟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已不是生死攸關的思考問題。現在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才能提高中國人生活環境的文化質素，如何重建中國人對文化及精神領域的興趣，如何在新一代中國人的心田中種下理想、幸福、博愛的種籽，以期發展中國人的精神文化境界。在二十一世紀，在全球已經頻繁交流的時代，中國人要創造優質的文化，要向上提升精神境界，不止是為了中國人自己，也是為了全人類。因此，我們不但要學習西方文化，也得審視自己的傳統，審視這一批我們最熟悉的文化資源。

我們認為，文化是要有所承襲、有所累積、有所批判、有所創新，才能繼續發展，蓬勃光大的。而且歷史文化的發展，涉及幾千年的創造、億兆人的心血，不應該用輕藐的態度來批判。批判是必要的，但要先了解批判的對象。我們請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就是因為他們學有專精，對文化議題的批判與建議都有根有據，不會無的放矢，隨意顛覆。

本輯的十五篇訪談，大體可分三大範疇：一是傳統文化如何創新轉化，二是文化建設的具體展現，三是藝術創造與文化創新的關連。屬於第一類的有：杜維明談儒家人文精神，林毓生談文化傳統如何可以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張隆溪談文化與語文教育的關連，湯一介談最近十年來中國知識界對文化問題的思考，樂黛雲談比較文學在中國的發展情況及新興的跨文化研究。屬於第二類的訪談，與第一類性質互有交疊，只是比較着重具體的歷史文化研究課題，如陳來討論最新的出土文獻資料如何影響了古代哲學研究，葉朗談意境在中國美學中的重要，唐振常談市民意識與上海社會發展的關係，李歐梵探討上海與香港的都會文化，陳萬雄談出版學術文化著作的意義。第三類訪談則與藝術創作、鑑賞及研究有關，有王己千談藝術創造與中國古畫的收藏與鑑賞，石守謙談藝術史教育的問題，薛永年談中國美術史研究的發展情況，李寶春談他從事京劇表演的體會，龍應台則以作家的敏銳觀察與我們縱論上下古今。

這些訪談既涉及了傳統，也涉及了現代，同時也有“後現代”的觀點，不過，這裏的確沒有以批判理論為主導的後現代論述。這並不表示我們排斥“後現代”觀點，而是在論述的方式上，我們盡量少用理論話語，以期接觸更廣泛的聽眾與讀者。

奔波辛勞都是“甜蜜蜜”

一本書的成形，是許多人心血的凝聚。我要在此感謝兩個單位——香港城市大學(特別是校長張信剛及教育副校長高

彥鳴) 及香港電台(特別是普通話台台長張圭陽)，沒有他們的促成，這個文化訪談節目不可能出現。我也要感謝副手馬家輝博士的策劃與聯絡工作，沒有他鍥而不捨的努力，根本不可能順利進行訪談。我更要感謝中國文化中心的幾位老師與助理(簡良如、徐麗莎、于昕、戴燕、張為羣、賴慶芳等)，沒有他們認真的轉錄與編輯，訪談資料就不可能變成文字，在此呈現給讀者。最後，我要謝謝好友陳萬雄兄，因為他與我們有着相同的文化關懷，而比我們更有實幹的精神。一聽到我有整理訪談的出書計劃，馬上積極佈署編輯工作，由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假如我們的工作，能推動香港文化的發展，有助於香港文化的定位，則過去一年的奔波辛勞，回味起來，都像一部香港電影的片名，是“甜蜜蜜”的。

目 錄

序 (鄭培凱)	iii
(一) 儒家人文精神的當代意義 (嘉賓：杜維明)	1
(二) 五四時期一元式反傳統思想 (嘉賓：林毓生) ...	19
(三) 語言、文化與傳媒 (嘉賓：張隆溪)	33
(四) 文化十年1989—1999 (嘉賓：湯一介)	49
(五) 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 (嘉賓：樂黛雲)	65
(六) 考古新發現改寫哲學史 (嘉賓：陳來)	81
(七) 美、意境與中國美學 (嘉賓：葉朗)	97
(八) 市民意識與上海社會 (嘉賓：唐振常)	115
(九) 現代雙城記 (嘉賓：李歐梵)	127
(十) 文化出版新視野 (嘉賓：陳萬雄)	143

ii 文 化 超 現 代
目 錄

(十一) 中國畫的創造與鑑賞(嘉賓：王己千)	157
(十二) 藝術史教育與時空多元性(嘉賓：石守謙)	173
(十三) 二十世紀中國美術史研究(嘉賓：薛永年)	189
(十四) 京劇藝術縱橫談(嘉賓：李寶春)	205
(十五) 從文化超越到飛龍在天(嘉賓：龍應台)	225
言說風流——“文化超現代”節目的來龍去脈(馬家輝)	242

嘉賓：杜維明

儒家人文精神的當代意義



“我們希望儒家有第三次的發展，就是儒家從中華文明變成東亞的文明；體現之後，再變成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但前提是必須有多元、開放的心態，而不是強調一枝獨秀，只說我們比你們高明。”

儒家人文精神的當代意義

主持：鄭培凱 馬家輝

嘉賓：杜維明，1940年生於昆明，台灣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1961年獲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翌年前往哈佛大學深造，並於1963年及1968年分別取得碩士及博士學位。曾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北京大學、台灣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法國高等學院。1988年獲選為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1990年在夏威夷擔任文化與傳播研究所所長。1995年應印度哲學委員會邀請，在南亞五大學府發表演說。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1981至現在於哈佛大學擔任中國歷史及哲學教授。出版英文著作合共十一本，中文論集十三冊，皆以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為議題。